

《论语》

(春秋) 孔子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 全书总共 20 篇 计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

《论语》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平日的言行记录收集起来、整理编成的。其中有孔子的言论，也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

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名丘，字仲尼。他父亲孔纥，又名叔梁纥，曾做过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宰，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下层的“士”。他的母亲姓颜，名叫征在。孔子 3 岁时，父亲就死了，17 岁时母亲也死了。孔子青年时，曾做过管理仓库(委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后来孔子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的学说。他生活

于春秋大变革时代，他反对以政、刑来强迫人民服从。他所说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分的。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为了争霸，是讲究实力，着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纳孔子“仁”的政治主张，孔子也没有被重用。孔子师徒颠沛流离 14 年周游列国，于公元前 484 年（鲁哀公十一年）返回鲁国，这时孔子已是白发苍苍的 68 岁的老人了。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籍——“六经”。

公元前 479 年，孔子去世，享年 72 岁。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其言论，编成《论语》一书，共 20 篇，计 492 节，合计 12700 字。《论语》记到孔子晚年的学生曾参的死为止，其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它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

孔子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德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所以他主张“为政以德”，这反映了当时人的价值的提高和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特征。因此，孔子的道德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所谓“礼”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来，周礼最重要的原则是尊尊与亲亲。为了贯彻亲亲和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上下尊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因此，孔子对于不按自己名分行事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如他批评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鲁国的三桓在祭祖时，唱起天子祭祀“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雍》诗 也受到孔子的指责。

孔子道德思想的范畴，主要是“仁”。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有多重涵义。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三是“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孔子主张“仁” 孟子重视“义”。所以，孔子的“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与他的继承人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对后世志士仁人的影响极为深远。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对子路、冉有的不同教育就可以说明：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和冉有问孔子请教的是同一个问题：听到一个很好的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做呢？孔子却对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回答。他对子路说：“家里父兄在，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再说，哪能马上去做呢？而对冉有却是加以肯定：应当马上去做。站在一旁的公西华想不通，便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开导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遇事轻率，所以加以抑制。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教师，必须掌握学生在学习上常犯的四种毛病，即广泛而不精、知识面过窄、把学习看得太容易和有畏难情绪。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才能给予帮助、补救。就是说，学生心理的差异性，决定了因材施教的必然性。

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

讨论，互相启发，以收到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他们师生间互相问对、讨论的情况。如子路、颜回、子贡和子夏就是这样做的。

性率直而鲁莽的子路，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也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也能接受。当有的学生对子路不太尊重时，孔子对他们说：子路的学问是不错的，只是还不够精深罢了。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但由于颜回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孔子曾不满意地说过：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子贡是孔子言语科的高材生，他经常向孔子请教《诗》。有一次子贡引《诗经·卫风·淇奥》篇上的话说：“《诗》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其斯之谓与？”（《论语·学而》）意思是，《诗经》上说 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切磋它，琢磨它，精益求精。孔子听了高兴地说：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子夏是孔门晚辈中的高足，长于文学。有一次，子夏引《诗经·卫风》上的诗句 向孔子请教：“‘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论语·八佾》意思是，《诗经》上说 有酒涡的脸笑得真美呀 黑白分明的眼睛流传得真叫人喜爱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高兴说：“卜商

呀，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进一步讨论《诗》了。孔子敢于承认比他小 44 岁的子夏在学问上对自己有启发，说明孔子能向被教育者学习的勇气，其精神可敬佩！

儒家学说后来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学说，《论语》就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经典。到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到了清明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这一来，当时的读书人都把《论语》奉为“圣典”背得滚瓜烂熟。

（张秀平）

《孙子兵法》

(春秋) 孙武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著的一部军事经典著作。

孙武的生卒年月现已不可考。他本是齐国人，后移居吴国，因擅长兵法，被吴国大臣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庐。孙武将其所撰兵法 13 篇献给吴王。阖庐遂以孙武为将，出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扬名诸侯之间。孙武最后终老于吴国，葬在吴都巫门外。

《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和内容出自孙武。但后人因《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有 82 篇、图 9 卷，而多认为 13 篇是曹操削除繁冗，取其精粹而成。又有人因《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即《孙臆兵法》久已失佚，后世流传的只有一部《孙子兵法》，而认为 13 篇出自孙臆之手。不过，在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部《孙臆兵法》和《孙子兵法》的残简以及记载孙武言行的 70 余枚竹简后，学者们已多倾向于 13 篇应出自孙武之手，82 篇则是孙武后

学所著，是用以补充和解释 13 篇的。

《孙子兵法》共有 13 篇，各篇均有其主题思想，但又构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计》篇论述的是能否进行战争的问题。孙武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道”、“天”、“地”、“将”和“法”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道”指使人民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天”指昼夜、晴雨、寒暑等气候时节和天命、人事、道义；“地”指土地和地势、地形的高下、险要、平坦、距离的远近，攻守进退的利弊；“将”指将帅的智谋、赏罚必言、爱抚士卒、英勇果断和军纪严明；“法”则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职责的划分和管理，以及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孙子认为，从这五要素出发，根据国君是否贤明，将帅有无才能；“天”、“地”二方面的条件如何，法令能否贯彻实行，兵力强弱与否，军队是不是训练有素和赏罚是否分明，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从而采取适当的对策和相应的行动。

《作战》篇主要阐述的是如何进行战争。孙子认为，战争的消耗和战费的开支是十分庞大的，战争旷日持久势必危及国家的存亡。所以，他主张速胜。此外，为弥补己方的消耗和削弱敌国，他又主张“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

《谋攻》篇主要论述了如何进攻敌国的问题。孙子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取得最大的成功，即力求

不战而胜，不靠硬攻而夺取敌城，不需久战而毁灭敌国。所以，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就特别强调以谋略取胜，并指出：用兵的上策首先是以政治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取胜，下策才是攻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需要知己，还要做到知彼。

《形》篇主要讲如何利用物质之“形”来保全自己，取得完全的胜利。孙子认为，只有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当取胜条件不足时，应采取守势；当取胜条件具备时，则应采取攻势。因此，会用兵的人善于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必胜无疑的地位，擅长于创造战胜敌人的机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他所战胜的是已经注定要失败的敌人。而上述足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物质之“形”便是由国土的大小所产生的物产、军资、士卒的多少，以及军事实力对比的强弱。

《势》篇主要阐述如何造成有利的态势来压倒对方。孙子认为，只要选择有才能的将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为基础，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有利态势，士卒就会勇猛无比地战胜敌人。而要造成有利的态势，就必须正确组织和部署兵力，善于指挥调动军队，擅长出奇制胜，即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奇”、“正”是相辅相生的关系，它们的变化

是无穷的。所以，要出奇制胜，就应善于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情况的变化，改换奇正的战法。此外，要造成有利的态势，还必须善于故意向敌示弱，诱敌以利，以达到欺骗和调动敌军的目的，造成战胜敌军的有利时机。

《虚实》篇主要论述指挥作战如何争取主动权，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孙子认为，要取得主动，就要善于诱敌以利，调动敌军而不被敌军所调动，就要善于了解敌情和隐瞒我军的意图、行动和用兵规律。如能做到这些，就能掌握主动，集中我军兵力，分散敌军兵力，利用敌军的弱点和错误，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敌而制胜。

《军争》篇论述的是如何通过机动掌握主动，先于敌人造成有利态势和取得制胜的条件。孙子认为，两军相争时，最困难的莫过于要懂得将迂曲视为径直，以不利为有利，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之地，先敌取得制胜的有利条件。孙子还指出，要先敌取得制胜的条件，必须避免轻率冒进，要把握各国的动向，了解道路、地形，重视向导，善于欺骗敌人。根据情况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擅长指挥军队，根据军队的士气、军心和军力，因敌而变，去夺取胜利。

《九变》篇主要论述如何发挥指挥上的灵活性。孙子认为，灵活性的基础在于对利弊进行全面的衡量。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设法威胁、挫折和困扰敌

国，以利诱敌，才能常备不懈，使敌人无机可乘。只有全面看待利弊，在有利的情况下看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的因素，方能根据具体情况，趋利避害，采取相应的对策和行动。

《行军》篇主要讲述了如何配置、组织军队，观察判断敌情和团结将士。孙子认为，行军作战必须占据便于作战和生活的有利地形，善于根据地形配置兵力，必须对敌情进行细致的观察，善于深谋远虑，从现象到本质，对各种症候作出正确的判断。孙子还指出，将帅只有在取得士卒的信任后，才能用教育和惩罚相结合的方法训练好士兵，率领全军去争取胜利。

《地形》篇主要论述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如何指挥军队的行动。孙子认为，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将帅应重视地形，善于利用有利地形，避免不利地形。在此基础上，将帅如能做到知己知彼，正确判断敌情，以夺取胜利为行动的唯一准则，并能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服从指挥，那就能无往而不胜。

《九地》篇论述了九种不同的作战地区指挥作战的原则。孙子认为，在不同的作战地区，将帅应根据地形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行动。用兵的原则在于善于发现敌人的可乘之隙，乘其不备，迅速行动，集中兵力，抢先攻占其战略要地，以压倒敌军的抵抗。

《火攻》篇主要指出火攻的目标、种类、发火的物质和气象条件，以及实施方法。孙子认为，火攻只是

辅助军事进攻的一种手段。所以，火攻者应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军骚乱，适时发起攻击，发展并扩大战果。

《用间》篇主要论述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孙子认为，是否了解敌情对战争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要先知敌情，只能求诸间谍。只有大圣大智大仁大义之人才能使用各种间谍，获得广泛的情报。

《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它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孙武在其书中揭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不但深受战国以来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和推崇，对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内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仍有其不可抹煞的科学价值。《孙子兵法》虽不可避免地受到它所处时代的限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它的光辉，丝毫无损于它的伟大。

（张秀平）

《史记》

(汉)司马迁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太史令，时年 38 岁。这样，使他有幸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 116 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 99 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辩护，解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 91 年），司马迁忍受着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 18 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惲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 50 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取的原名。《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那就是后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 种体例组成。“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

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

《史记》全书 130 篇，由本纪 12 篇、表 10 篇、书 8 篇、世家 30 篇、列传 70 篇组成，计 526 500 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近 3000 年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制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二，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

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司马迁是歌颂的，因此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且将陈胜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除此之外，司马迁还表彰了为国捐躯的刺客，敢于和暴力对抗的侠客。相反，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残和奸诈，活灵活现。

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的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受到破坏，由此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史记》中充分体现司马迁重视经济的篇章有：《八书》中的两篇，《河渠书》记载夏禹

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的经济情况。除此之外，《货殖列传》还记载一些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辈。可以说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在战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由司马迁创立的。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成为了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受到“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